

甲骨集史

刘桓著

中華書局

甲骨集史

刘桓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骨集史/刘桓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10

ISBN 978 - 7 - 101 - 06249 - 6

I. 甲… II. 刘… III. 甲骨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K877. 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214 号

书 名 甲骨集史

著 者 刘 桓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1/4 插页 4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249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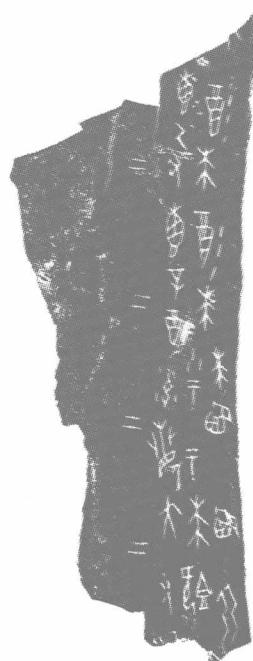
定 价 38.00 元

商周古史須新作
甲骨遺文暨眾析
(作者自書)

商周古史須新作
甲骨遺文暨眾析
(作者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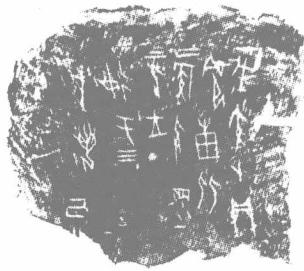
《合集》64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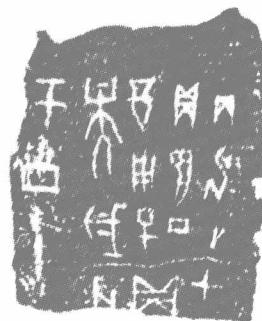
《屯》4233



《合集》5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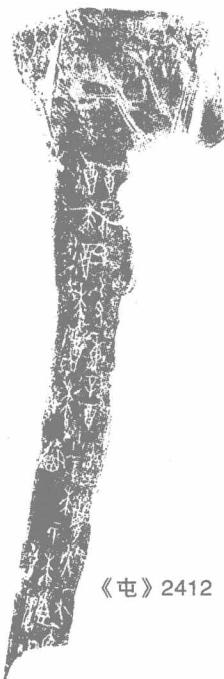
《合集》7242



《合集》3018



《合集》14206正



《屯》2412



《合集》7781



《合集》7782

《甲骨集史》是刘桓教授在近二十年期间撰著的第四部甲骨研究的专题论文集。其前三部是 1989 年的《殷契新释》，1992 年的《殷契存稿》和 2002 年的《甲骨征史》，我都有机会写序，读者也可看我的《拥彗集》、《清路集》，序中已经表达了对刘桓教授辛勤治学、矢志不渝的深切感受。相信《甲骨集史》的读者，一定会同样认识到他的深厚积累以及丰硕成就。

殷墟甲骨的发现与鉴定，时在清末的 1899 年。最近我屡次说到，这和 1799 年古埃及罗塞塔石刻的发现，刚巧相隔一百年。罗塞塔石刻给古埃及文字的解读提供了钥匙，甲骨文的出现也为探讨商代还有更早的历史文化准备了基础，两者都不愧是学术史上有关键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甲骨文刚刚为学术界所知的时候，学者主要是从文字源流的角度估量其珍贵价值的。如最早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孙诒让《契文举例》，其自序云：“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以后。赏鉴家所彝为商器者，率定不能确信，每憾未获见真商时文字。”及至看到《铁云藏龟》，不禁赞叹“不意衰年睹兹奇迹”。不过他所作考释，已经涉及“官氏”、“方国”、“典礼”等历史内容。到 1910 年，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即已指出甲骨文“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将考订历史放在第一位了。

1914 年，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于甲骨文中发现商先祖王亥之名。随后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在探寻古史上取得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到了 1925 年，王国维先生于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把通过甲骨文等“地下之新材料”来研究古史的经验提高到“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高度，对后来的古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甲骨本来是一种考古文物遗存，大家知道，不管是考古学，还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都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研究甲骨文，最终目的是认识古代的历史文化。刘桓教授多年的工作，始终坚持这一点，他的大量论作，都是由文字的考释进而讨论历史的重要问题，因此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说，绝不意味贬低考释文字本身的学术意义。实际上，即使是突出强调历史研究理论性的学者，如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字研究》中便曾指出：“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只有正确地释读了文字，才有可能揭示甲骨文所蕴藏的历史，否则不但不能知道古史的真相，反而会对理解古代产生误导的负面作用。

《甲骨集史》所收论文，大多与殷商历史重要问题相关，如《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关于商代贡纳的几个问题》、《试说卜辞的“奠某侯”与建侯的关系》、《商代祭祀时的仪仗队》等等，都论及商代的制度和礼仪；《关于殷代武丁的辅弼之臣傅说的考证》、《舌字构形释义》、《无赦鼎、般甗与晚殷征人方之役》、《卜辞所见周文王时期的商周关系》、《关于吕尚的出身及其被举用史事索隐》等等，都讲到商代的史事和人物。关于甲骨文最新发现的，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若干字词释读》、《关于殷墟卜辞中“丁”的问题》等篇；关于学者间争论问题的，有《释甲骨文“辠”字》、《关于所谓“亚醜”的“醜”字的释读》等篇。至于在文字释读解义等方面别出新义的，还有好多，这里不能遍举。

当前正是新世纪初期，甲骨研究在经过百年以上众多学者努力之后，正迈入全面深入的发展新阶段，相信刘桓教授会继续前进，取得更多更重要的成果。

李学勤

2008年7月7日

于清华园荷清苑

目 录

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	1
关于商代贡纳的几个问题	15
关于殷代武丁的辅弼之臣傅说的考证	45
关于殷墟卜辞中“丁”的问题	65
商史札记三则	78
说殷代的鬯祭	87
试说卜辞的“奠某侯”与建侯的关系	92
无㝵鼎、般甗与晚殷征人方之役	95
卜辞所见周文王时期的商周关系	104
关于吕尚的出身及其被举用史事索隐	131
关于殷代乙卯尊铭文的释读	138
也谈伯唐父鼎铭文的释读	
——兼谈殷代祭祀的一个问题	144
释甲骨文辠字	
——兼说“王辠于(某地)”卜辞的性质	150
释甲骨文𠂇、𠂇二字	161
试说甲骨文𠂇字的构形	171
关于所谓“亚醜”的“醜”字的释读	174
释甲骨文虍字	176

蛇字补释	183
甲骨文字考释两则	185
舌字构形释义	197
殷契札记四则	200
释关(甾)并再释“咢伐”、“关伐”	205
释甲骨文谷、扇二字	207
商代祭祀时的仪仗队	213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若干字词释读	215
试说“贊”与“術”	219
释 乖	222
释“𠂇益𦥑”	225
读《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两则	228
金文札记两则	231
释《九年卫鼎》中的“罷”字	234
补说甲骨文𠂇字的字源	236
释 穀	237
释甲骨文𦥑字	241
𠂇字补释	244
后 记	249

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

殷墟甲骨卜辞中记有“大宾”字样的卜辞，其中尚隐藏着一些历史文化内涵，有待于我们深入开掘解读。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有卜问“已宾”、“贞宾已乍”等卜辞。以前郭沫若先生等加以释读^①，所释虽不无可取之处，然因卜辞简略难明，释读尚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解决。近年，我个人发现，上述卜辞实与武丁“西省”及“作大邑于唐土”的卜辞相关联，则又是前人释读所未涉及的问题。我认为上述卜辞本是互相关联，反映武丁西省欲在唐地作大邑的史实，以前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却未见有将它们通盘考虑，再进行释读的。而且，过去的释读多停留在文字释读的层面上，与古史研究结合得不够紧密。由此看来，将上述与“大宾”之祭有关的一系列卜辞作为整体通盘考虑加以释读，在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上仍然具有拓荒性质。本文谨就此略抒拙见，唯因拓荒，不免粗略，文中若有谬误不当之处，敬祈读者特别是方家教正。

一、大宾之祭

在殷墟卜辞中，有一片记有大宾之祭的武丁卜辞十分引人注意。其中有：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1113 片考释，文求堂，1937 年；唐钰明《卜辞“我其已宾乍帝降若”解》，《中山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刘桓《说“我其已宾乍帝降若”》，载《殷契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

癸丑卜，争，贞：我宅兹邑，大旁，帝若。

癸丑卜，争，贞：帝弗若。 《合集》14206 正

所谓“大旁”，应指大型的“宾”祭，犹他辞“大御”（《合集》32329 正、32330）指大型的御祭。

值得讨论的是“大宾”的内涵。自夏代以来，人们对于至高无上的上帝神的信奉所形成的神秘观念是，只有统治者死后可以升天，因而能宾于上帝之所，在上帝之左右。《山海经·大荒西经》：“开（即夏后启，避汉景帝讳改）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郝懿行疏：“《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宾、嫔古字通。棘与亟同，盖谓启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清代朱骏声对“启棘宾商”之句加以校订，认为“商”“当作帝，天也”^①。其说甚确。商代先王能升天在帝所的记载，见于《叔夷钟》：“夷箕其先旧，及其高祖，虞虞（赫赫）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书·召诰》：“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诗·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西周统治者仍然信奉这一观念，相信其先王能升天，在上帝（帝廷）左右。《诗·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下武》：“三后（据毛传，指大王、王季、文王）在天，王（按指武王）配于京。”周厉王所作《懿簋》，铭文自言：“其各前文人，其瀕（频）才（在）帝廷陟降。”诸如此类，表明这种观念的流传，在夏、商、周三代绵延不绝。

在商代，先王常被搬出来干预政事。先王们既可以对下土的王及臣民进行保佑，也可以对王及臣民降灾祸进行惩罚。《书·盘庚中》载：

^①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商”字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905页。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联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

若是在位的王“失于政”，先王就降罪疾，责问他：“为何虐待我民？”若是万民不好好谋生，不与商王的谋划同心，先王亦降罪疾，责问：“为何不与我的幼孙（指商王）亲密团结？”商先王的这种能力，无疑与认为他们死后可以升天，宾于上帝左右有关。这是商代神秘的天命观的体现。

殷人认为商先王死后可以升天，宾于上帝左右，因此当商王举行“大宾”之祭时，往往要反复贞问数位先王能否宾于上帝，希望祭祀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宾”祭的目的是要祭祀上帝，借以求得保佑，维护统治秩序，使得心想事成。因为借助这种“宾”祭，“沟通了天帝、先王，也使自己的权威得到了宗教意义上的证明”^①。从卜辞看，殷人宾祭是围绕着上帝进行的。上帝在殷人心目中地位甚尊，不轻易降临，因此，只有举行“宾”祭，才可以使下土商王对上帝的敬畏之情与祭祀诚意，通过能升天的先王转达给上帝，“宾”祭实际上也是祭天的重要环节。

武丁卜辞中恰好就有关于宾祭的记载，可以提供“大宾”之祭祭祀对象方面的信息：

贞：大甲不旁于帝。
贞：大〔甲〕旁于帝。
贞：下乙不旁于帝。

贞：下乙〔旁〕于帝。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甲辰卜，殷，贞：下乙不于……

贞：下乙不于咸。

贞：咸不于帝。

贞：大甲不于咸。

贞：咸不于帝。

贞：大甲于咸。

贞：咸于帝。 (《合集》1402 正)

这版连卜卜辞，先是分别贞问大甲、下乙（祖乙）^①是否宾于上帝，接着分别贞问下乙、大甲是否宾于咸（咸，应如学者所论证的是指成汤^②，旧说以为是巫咸，显然是不对的），然后由咸（成汤）宾于上帝。成汤、大甲和祖乙都是商代历史上的“盛君”、“明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晏子曰：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无后……。”骈宇骞先生《晏子春秋校释》：“‘祖乙’，《论衡》作‘祖己’。孙星衍云：‘太甲，汤孙；武丁，小乙子；祖乙，河亶甲子。’”^③（《论衡》指《论衡·死伪篇》，该注已说明）《孔丛子·论书》：“公西赤曰：‘闻诸《晏子》，汤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为王居丧行不义，同称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计功而除过。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以此观之，虽四于三王，不亦可乎！’”文献中以汤、大甲、祖乙、武丁为盛君明王的说法，流传有自，《孔丛子》虽系伪书，亦系抄摘古书而成，例如伊尹放太甲的说法，就与《孟子》相合，故亦可作为参考。由此说来，毫无疑问，殷

^① 胡厚宣《卜辞下乙说》，《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1940年。

^② 陈复澄《咸为成汤说》，《辽宁文物》1983年第5期；蔡哲茂《说殷卜辞的𠂇字》，第九届中国文字学研讨会论文。

^③ 骈宇骞《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人认为大甲、下乙(祖乙)、咸(成汤)这三位先王都有资格升到天廷,宾于上帝;不过三人相比较,则只有受天命征夏建立商朝统治的高祖成汤最具有宾于上帝的资格。所以,这版卜辞贞问大甲、下乙(祖乙)宾于咸(成汤),再由咸宾于上帝。

从古书的记载看,在死后能升天的人(王、侯)中间,由于各自身份、资望存在差别,根据宗法决定了有的人升天后只能在先王之左右间接佐事上帝,还不能直接宾于上帝。

《左传·昭公七年》载:

齐卫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郕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杨伯峻注:陟恪犹言登假,同义词连用,谓升天也。说详王引之《述闻》^①),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

周王追命卫襄公之词,是说卫襄公升天后,在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卫国始祖康叔,与周武王为兄弟,故卫国后来的国君死后升天,可以在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是王与同姓诸侯的等级差别也表现在死后升天在天廷的位置上。殷代大甲、下乙两王资望、业绩无法与成汤相提并论,故这两王升天后,应是在殷先王成汤(咸)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由此看来,以上贞问大甲、下乙(祖乙)、咸(成汤)三位先王宾于帝的卜辞,起码可以说明“大宾”之祭是祭以成汤为首的著名先王,尽管由于卜辞残缺,宾祭对像或许还有遗漏,但这也不失为卜辞所记“大宾”之祭的绝好注解。

殷代的“大宾”之祭,祭祀多位先王,却并非无事而祭,实与迁邑之事直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中华书局,1981年,第1294页。

接相关。前引卜辞明言“我宅兹邑，大房，帝若”、“帝弗若”。“宅”作为名词时指住宅，《说文》：“宅，人所托尻也。”（段注本）上引卜辞的“宅”则为使动用法，乃居住之意。《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此处成王“欲宅洛邑”，是说他想居住在洛邑（实际意思是在洛邑建都），因此，才使召公先去那里相宅。《书·召诰》：“知今我初服，宅新邑。”伪孔传：“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西周成王时《何尊》云：“隹（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乂）民。’”唐兰先生意译为：“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就向天卜告说：‘我要住在中央地区，由这里来治理民众。’”^①凡此均可证“宅”为居住之义。“兹邑”的“兹”为代词，意为此。则卜辞“我宅兹邑”，意即“我居住在此邑”，也就可以明瞭。

西周周武王时的朕簋铭文，据学者研究所反映的是周武王东土度邑的史实^②。其铭文云：

乙亥，王又大豐（礼），王凡（盤）三方。王
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
衣（卒）祀于不（丕）显考文王，
事（使）喜上帝。（下略）

此铭之“王祀于天室”，正与《何尊》说武王克大邑商之后“则廷告于天”相合。旧释多以“衣祀”为“殷祀”，实不可通。从古音方面说，《书·康诰》作“殨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郑玄注：“齐人言殷声如衣。”衣、殷声近故相通，可以说得过去。然细审铭文原意，乃是记载一次祭天的过程，便知将“衣

^①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74页。

^② 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

祀”释为“殷祀”，有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王祀于天室之后又祀文王，何以单单殷祀文王，在礼制上无法讲通。其实，铭言“大礼”，所指正是祭天，即至天室祭祀上帝。祭罢上帝，又祭祀（在上帝左右的）父王文王，以使上帝喜悦。至此祭祀即告结束，故铭文称后一祭祀为“衣祀”，衣通卒，即“卒祀”。

西周成王时《何尊》说：“隹（唯）王初酓（迁）宅于成周，復面（稟）珷王豐（礼），福（福，义为裸）自天。”铭文所述的“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此举是否事实上为迁都尚存在争论，暂且不说，但这是与“宅邑”有关的迁徙行动，则可断言。铭文中的“天”即“天室”，亦即“殷天室”，其地当在距离成周洛邑不远的太室山（中岳嵩山）附近。

殷周礼制相因，上述两次西周初期因度邑、宅邑而祭天之举，可与殷墟卜辞因欲“宅邑”而“大宾”之卜相印证。

二、释“已宾”

甲骨文屡见“已宾”一词，释读已字有两种读法，由于已为祀字所从，学者自然会想到读已为祀，郭沫若先生起初即作如此读^①。可是后来当郭沫若先生继续研读这些卜辞时，却发现释祀根本无法通读，因此改读已为读已^②，尽管“已宾”仍未能通读，读已还是正确的读法。不过，此后仍有读已为祀的^③，盖因郭说释读十分简略，且仍存在可商之处，尚须进一步研究和阐释的缘故。近年来，个人接触战国楚简文字，由于看到已、已二字屡屡通用，获知已、已应为同一字，始联想到卜辞“已宾”应从郭说后一种读法。《郭店楚墓竹简·缁衣》：“而赋（富）贵已逃（过）也。”同书《成之闻之》：“其勑（胜）也不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1113 片考释。

② 同上。

③ 如唐钰明《卜辞“我其已宾乍帝降若”解》、刘桓《说“我其已房乍帝降若”》。